

你我有别:关系如何影响道德责任归因

郭 晓^{1,2}

(1.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8;2.浙江大学 科技与法律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08)

[摘要]道德责任归因是对道德责任进行认定与划分的过程。综合考察发现,人们在进行道德责任归因时会受到“人际关系”与“角色类型”的影响;与归因者利益关系的亲疏远近,会决定归因者对其“内部归因”还是“外部归因”;对特定角色、特定行为的期待会影响归因;“区分你我”是人类的一种天性,人们往往对自己与他人采用不同的归因标准;在自我责任归因中,适用于他人责任归因的特点和免责条件失效了,对自己倾向于内部归因,免责条件较之他人也更为苛刻。证据展示了人类“道德责任归因”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关键词]道德责任归因;内部归因;外部归因;自我归因;自尊;自我中心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0)04-0023-07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0.04.004

Interpersonal Differences: How Does the Relationship Affect the Attribution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GUO Liang

(1. Guanghua Law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08, China; 2.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Law,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08, China)

Abstract: Through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we found that people's attribution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is influenced b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First, the closeness or alienation of the attributor's interest relationship would determine whether the attribution is "internal attribution" or "external attribution". In addition, expectations of certain behaviors made by certain kind of roles will affect people's attribution. Last but not least, it's a kind of human nature that people distinguished "you" from "me" and thus using different attribution standards for ourselves and others. In the attribution of self-responsibility, the characteristics applicable to other people's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ondition of exemption from liability are invalid. Evidence shows the particularity and complexity of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Key words: moral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internal attribution; external attribution; self-attribution; self-esteem; egocentric

责任(responsibility)通常被视为伦理学的核心概念,相应地,道德责任与道德责任归因构成了道德哲学的核心议题。一般认为,“道德责任归因是指依据行为者的特定行为或疏漏而在

道德上值得称赞与奖励、责备或惩罚的状态,以及对责任(或荣誉)进行认定与划分的过程。”^①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指出,道德责任只能归于“理性主体”,“理性”意味着人的行为是

收稿日期:2020-05-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5CZX017);浙江大学争创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201502)

作者简介:郭 晓(1986—),男,湖北鄢阳人,科学哲学博士,浙江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道德哲学与实验哲学研究。

有目的、自愿选择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后来的“选择的可能性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础。“尽管亚里士多德的世界秩序已经破裂,但是它并没有将美德(和恶习)带到历史的坟墓中。”^[1]维也纳学派奠基人石里克(Schlick F A M)指出,“伦理学的中心问题是对道德行为的因果解释”^{[2](P399)},也就是研究“责任归因”问题。在石里克看来,“伦理学是一种事实的解释,伦理学的中心问题是解释道德行为的原因。”研究“实际被视为行为准则的东西是什么”的规范伦理学问题“空洞无味”,而研究“它为什么被看作是行为准则”的问题则导向深刻性^{[2](P398)}。无论“有趣”还是“空洞”,伦理学都需要清晰的事实基础——“责任归因”是什么。

道德哲学的研究传统上认为,人们进行道德责任归因具有相对统一的机制。然而,实际上传统思辨的模型与真实的归因有时存在不小的差异。有研究指出,情感和记忆在道德判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脑成像技术“对依赖‘意志自由’进行道德责任评判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提出了挑战”^[3]。经典道德责任归因理论将“控制”视为道德责任归因的首要因素,而事实却是“‘部位’与‘责任’的相关度大于‘控制性’,‘部位’对责任归因的解释力也强于‘控制性’”,“部位”取代了“控制”成为责任归因的首要因素^[4]。造成这类差异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人类在道德责任归因的过程中其实“相当随性”,道德责任归因中的人际差异非常显著,值得重视。

一、人际关系与责任归因

就本质而言,人是社会性动物。亚里士多德曾极富先见地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这一点:“从本质上讲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那些生来离群索居的个体,要么不值得我们关注,要么不是人类。社会从本质上看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那些不能过公共生活,或者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过公共生活,因而不参与社会的,要么是兽类,要么是上帝。”这段话也出现在埃利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的名著《社会性动

物》一书的扉页。马克思同样强调了这一点:“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P18)}这被简化为著名的命题——“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广为传播。可以合理预测,人的社会角色及相应的人际关系,可能会对责任归因产生影响。事实的确如此。

这种“普遍人性”非常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道德责任归因,事实上“普遍人性”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我们的政治生活、经济参与等公共生活的诸多方面。在人际关系和角色类型影响归因方面,可以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

一是人们在进行责任归因时会考虑“人际关系”与“角色类型”。王茹等学者指出,“当人们处在不同的立场并且与情境中的人物有一定的关系时”,人们的归因可能会有所不同^{[6](P1824)}。他们通过Likert 7点量表,对120名被试进行了调查。问卷通过角色扮演,引入了被试与行为者的三种不同人际关系:朋友、陌生人与竞争对手。通过情境引入、呈现行为经过和考察归因过程及好感度变化,发现“角色类型主效应及其与人际类型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人际关系类型主效应显著($P < 0.05$)”,“角色类型差异不显著($P > 0.05$);人际关系类型主效应及其与角色类型的交互作用均显著($P < 0.05$)”,具体而言,“角色类型在朋友水平上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而“人际关系类型在自己水平上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这表明,我们期待着朋友能扮演好他/她的“角色”——因为朋友是困境之中我们可以求助的人,而“自己”也应该明白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人际类型的变异来源为“自己”时,简单效应分析中,“朋友(4.90 ± 1.71) > 竞争对手(2.90 ± 1.37) > 陌生人(2.80 ± 1.40)”^{[6](P1825)},这表明,事实上人们的确明白自己的“人际位置”,并在努力满足社会的“期待”——“自己”一旦和“朋友”角色互换,就可以非常有效地解释该研究,并整合该研究结果。

二是与自己利益关系越密切,对于负性结果人们越倾向于对其“外部归因”——这有助于他/她减轻责任以及相继而来的惩罚;与自己的关系越疏远,人们越倾向于对其“内部归因”,这会导致其承担更多的责任和惩罚——这或许对我们是“有利”的,特别是当被归因者是竞争对手时尤其如此。“在内部归因维度上,角色类型在朋友水平上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即在角色类型为自己时更愿意相信朋友的行为是外部原因所致”^{[6](P1826)}。将负面结果归结为“不得已”的外因更有助于维护被试的尊严、自信和社会声誉,即被试“人缘不错”,且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三是在责任归因中,我们对特定角色的行为期待会影响归因。在“朋友不帮助”案例中(“肖天”放弃了帮助被两个社会青年围住的“我”或“小阳”,“远远地经过,走了”),“虽然朋友与自己比朋友与他在归因上更偏向外部归因,但是朋友与自己的情感变化要比朋友与他人大得多”。负性结果的外部归因较之内部归因更像是一种“免责归因”,即“不得已而为之”——本情境中的外部归因为“肖天走开是因为他没看到你/小阳被欺负”,是“客观原因”:在相同的情境下,“朋友不帮助自己”较之“不帮助别人”,被更多视为是“外部原因”所致——他不是不愿意帮助我,只是没看到而已(因此,他一旦发现我受困,很可能就会过来帮助我);然而,尽管理性上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情感上却还是难以接受,于是产生了较大的落差(情感变化大)。事实上,“朋友不帮助”情境下的外部归因本身就有利于“我们”的社会声誉和尊严的维持;而对朋友的“失望”也是一种促使朋友感到内疚从而引发道歉、补偿以及敦促其后期改正的动力。因此,这种反应是合理的,“患难见真情”即是此种检验友谊的试金石。

对于“竞争对手不帮助”案例的情感变化也说明了这一点:“对于竞争对手,人们的前后情感变化最小,尤其当角色类型为自己时”。这是由于“人们最初对竞争对手的感情基调就不是很好,甚至并不期待其对自己或他人有什么帮

助”。没有期望,自然也就无所谓“失望”。不过,“竞争对手”不帮助他人的行为仍然会引起旁观者对其好感度的下降,“围观”的确是一种“进步的力量”——对此我们或许都有所体会。比如,哪怕是在陌生人面前也比独自一人时更加慷慨。不过,在此“期望全距”可能发挥了某种作用,以百分制计算,我们对朋友的期望通常位于60—100分之间,对陌生人的期望可能位于20—80分之间,而对竞争对手的期望很可能只在0—40分之间。^②同样一件事可以轻易地引发前者“剧烈的情感变化”而对最后者的影响则“顶天不过40分”,存在情感计量的“全距受限”(restriction of range)问题;这既会导致“低相关”的结果,也不利于进行比较。例如,中国A股市场上市值旗鼓相当、不分伯仲的“贵州茅台”^[600519]与“工商银行”^[601398]的股价如果“跟随大盘一起涨跌”,那么相同时间内“贵州茅台”的变化幅度将轻易超越“工商银行”的变化幅度——甚至“工商银行”的每股股价,^③因为“工商银行”的波动“全距受限”。

我们推测,如果将案例换成正性的即“帮助”模式(“朋友帮助”“竞争对手帮助”“陌生人帮助”),那么前后情感变化量大小的排序反而会是:竞争对手>陌生人>好朋友;竞争对手给了我们“惊喜”,陌生人展现了“温暖”,朋友则“一如既往地可靠”。不过,这一推测需要实证证据的支持。

二、“我”效应与自我责任归因

前文考察的都是他人责任归因判断,一旦涉及主体自己,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社会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阿伦森指出,自我中心思想(egocentric thought)和自利偏差(self-serving bias)是“自我”影响社会认知的两种一般方式^{[7](P124)}。前者“自我中心思想”是说,“大多数人倾向于更多地将自己视为事件的中心,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在许多回忆录中都能看到,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似乎发挥了比当时真实情况更大的作用,“把自己看得就像一位主

要演员,影响着事件的进程和他人的行为”;后者“自利偏差”则是指个体倾向于“对自己的成功进行性格归因,而对自己的失败进行情境归因”^[7](P124-126)。总体而言,这将导致“好事归我,坏事归他”的结果。这两个“一般方式”显著影响到了所有与“我”有关的责任归因问题。

“孩子是自己的好”这一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可以当成一条法则。对此,有一种解释是“主张与信仰/偏好的适应(耦合)”理论:“每个人都偏爱自己的主张——不是因为这是他(她)想出来的,而是该主张与他(她)的潜在信仰和偏好相适应。”^[8](P86) 丹·艾瑞里(Dan Ariely)指出,“一旦我们认为自己制造了某一事物,就会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已经拥有了它——我们就开始对‘我们’创意的有用性和重要性做出过高的评价。”^[8](P89)

事实上,这种“我/他”的区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阿伦森将之称为“内群体—外群体效应”,即“人们加以分类的最常见的方式是,将他们分为两个部分:属于‘我的’群体的人,以及不属于‘我的’群体的人。”^[7](P12) 即便“所有没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群体,也包括现代的人类社会,都有一个‘敌人’的概念,一个‘他们’和‘我们’这样的区分。”^[9]“二战结束之后俄国人和美国人彼此还将对方看成敌人和对手,从逻辑上来说这并非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从人性上来说这却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终于轮到美国和中国了;我相信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俄两国之间弥漫着一种亲密到暧昧的气氛,不仅仅因为俄罗斯向我们输送石油、天然气、S-400“凯旋”防空导弹系统和我们暂时造不出来的航空发动机,也不仅仅因为我们向俄罗斯输出大量“中国制造”、质优价廉的义乌小商品,更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美国。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恩怨情仇,就有拉帮结派、勾心斗角。金庸借“任我行”之口描述了“我/他”区分的普遍性,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句话则展示了合作、结盟的可能和“我/他”体系的复杂性。^④一个较大的社群里的

众多“我/他”完全可以像常见的聚乙烯一样形成聚合物,从而带来复杂的空间结构变化(~我~他~我~他~我~他~);这个高分子聚合物体系中,任意相间的两个“我/他”都有一起合作、成为朋友的可能性。^⑤毛泽东认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0],这个问题更是生活的首要问题——区分“我/他”及“我们”和“他们”,对于一个人的美好生活太重要了!

不难发现这里的层级结构:“我们/他们”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所以可以说“liquid biopsy 是我们做得最好”;然而即使在同一类“我们”之间,也还是可以再进行“我/他”的划分,所以你不能跟你同实验室、同性别的师兄共享“孩子是我们的好”。换言之,“我们”之中还可以而且应该有“我/他”之分,直到切分为彻底不可再分、个体的“我/他”。“人类之间这种区分你我的习惯极为盛行”,“很多人类社会,包括我所居住的最壮观的西方社会在内,都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们都被层层分割。我们住在小家族里,这些家族联合起来形成了部落,部落又联合起来形成了部落联盟,以此类推。”^⑥甚至在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看来,道德和法律也主要是为了“他们”而设置的:“道德法则和法律一样,当初创设它们的目的好像并非明显为了让人们在集体内和谐相处,而是让集体能足够团结以威慑他们的敌人。”^⑦区分你我、彼此博弈,这构成了我们生存图景的主要内容。赵汀阳清晰地论证指出,伦理道德的产生是一个依赖于存在论运气的“奇迹”,“伦理来自弱者之间的博弈均衡”^[11]。

简言之,“我们都是不可救药的部落动物”。这一论断至今尚未过时。《狱中书简》的作者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也曾指出,“‘不敌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可9:40)基督对其教会成员所划定的界限宽于他的门徒所愿和所划定的。”^⑧他在描述“基督的整体性和排他性诉求”中明示,“孤立的排他性要求会导致狂热和奴役,孤立的整体性要求则

导致教会的世俗化和自我放弃。”^{[12](P68)} 这是一种宗教性的“我们/他们”之分。可以将此种以自我为中心、惠及“我们”并首先区分“我/他”的认知特点和归因模式称之为“我效应”,这将会对道德判断和责任归因产生深刻影响。

我们是“自我中心”(egocentric)的物种。这是一种“普遍人性”。例如,人类对亲属的称谓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在所有的社会中,所有的亲属关系都是根据某个中心个体来进行分类的。我的父母不是你的父母,我的兄弟也不是你的兄弟。”^⑨“反认他乡是故乡”“误将他爹当己爹”这种错误,有时会让人付出生命的代价。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的那103名美洲开拓者中,一半以上的人由于严寒、食物短缺和疾病相继死去——“最先死去的人所拥有的亲属最少,而那些拥有父母以及其他亲属的人,则最有可能存活下来”。在那些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个人能否存活下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她)当时拥有的亲属数量”^{[13](P259-260)}。这是对“我效应”合理性与有效性的确证。不过这并非哲学家的新发现,“自我中心思想”与“自利偏差”已经得到了社会心理学的透彻研究,我们关心的是其认知特点和归因方式。

“我效应”在归因方式上表现明显:“自我责任归因的方式具有明显的自我取向——人们在面对不利情境时,普遍注重从自身角度寻找原因,而较少怨天尤人、推卸责任。”他人责任归因是一个二元结构模型,与自我责任归因不同,典型差异体现在对“可控性”的相关判断上,主要差异在两方面:归因部位与免责条件。

在归因部位上,自我归因实验中的被试倾向于归于“外部的”(根据况志华实验,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可变的(不稳定的)”,其原因在于:“在那些由个人自身原因导致的挫折或失败中,被试一般不将之归咎于不了解事实真相、能力水平低下或细心程度不够,而是归因于努力程度不够、重视程度不足、缺乏经验、对困难估计不足或知识缺乏。”^{[14](P347-348)}

在免责条件上,尽管理论表明在对他人的

归因中“不可控性”显著降低了相应的“责任”分配,被试还是在对自己的归因中倾向于认为失败是“可控的”;人们对自己反而更苛刻!“对于那些由于自身不可控起因导致的挫折或失败,并非如他人责任归因那样,被判定为无责任,而是倾向于认定本人应承担部分责任。”^{[14](P352)} 这可能与自尊(self-esteem)有关,不可控原因所致的失败可能有损自尊;在自尊与需要承担更多责任之间,人们做出了必要的权衡——也许压根都没有理性的“权衡”,只是交给了心智高度自动化的进程。

人们对于自我的挫折或失败通常会归因于“最高社会接受度”的那种;另一方面,个体(至少是在实验中)也会积极承担责任。不过笔者有点怀疑这受到了“实验者偏性”(experimenter bias)的影响:理性的人们完全清楚实验者在期待些什么,潜意识中他们也会助实验者一臂之力。由于社会声誉的原因,“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都高估了自己的利他倾向”^{[15](P34)},都会尽力扮演一个亲社会的角色——“勇于承担责任”无疑是一种值得赞赏的品质。约翰·A·利斯特(John·A·Lister)指出,“实验室中的亲社会行为比现实生活当中的更为显著,而且其水平也往往高于现实生活。”——我们应当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实验室中的被试很多时候是在“表演”——特别是当涉及个人评价和社会声誉时尤其如此。

换言之,个人自我责任归因中,适用于他人责任归因的特点和免责条件失效了。这种差异与“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有一定关系。基本归因错误是指,“当描述和解释社会行为的原因时,与情境和环境性因素的影响相比,人们会过高估计人格和气质因素的重要性。”^{[7](P120)} 可控性对“自我责任归因”而言,仅仅影响“程度”而不决定“是否”,“被试似乎并不认为自己对于那些内在不可控起因招致的挫折或失败不承担任何责任,只是责任程度稍轻而已”^{[14](P354)},这与他人责任归因的模式大异其趣——是一种“必须要有人负责”的责任

归因模型。由此引起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自我/他人责任归因的机制差异原因在哪里?另一方面,“可选择性”原则失效了吗?即,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自己也要承担责任吗?^⑩此外,在责任情感方面,由于无论“是否可控”都负有责任,因此负性结果情境中被试的情感体验以“自我生气或自我责备”为主。这种“生气”或者“责备”的由来可能是“虚拟对标”的存在,即那些“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想象。“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属于“反事实条件句”或“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哲学上由莱布尼茨提出、刘易斯和克里普克各自建构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理论、模态逻辑对此都有所贡献。张家龙指出,“给定了一个可能世界语义的框架(W,R)就可决定一个模态代数,由(W,R)决定的模态代数和(W,R)是等价的,即一个命题在(W,R)上有效当且仅当它在(W,R)所决定的模态代数上有效。”^[16]这种“可能世界”在我们头脑中真实存在。我们并不关心“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反事实语义问题,这种“生气”或者“责备”强调的是情绪的价效,较之他人责任归因中人们更容易产生的“同情”(怜悯)或“帮助”而言,这种“我/他”之间的区分是值得注意的。笔者认为,此种情感的区分是“我效应”的体现,与“期望”有关,“期望”非常重要。例如,在心理博弈(psychological games)之中,“博弈方是通过自己的实际收益与他期望中的公平收益的比较来判断对方是否对他善意的,进而决定自己的策略。”^⑪人们对自己往往有着高于“他人平均”表现或者平均绩效的期待——通常这种期待不是“高于平均”而是“远高于平均”,该种“生气”或者“责备”的情感恰恰是高期待与现实落差冲突的体现。

三、结论与讨论

由此可见,“责任归因”并没有扶手椅哲学想象中那样稳定的结构,它可能对人际关系、角色定位、“我效应”等多种因素敏感;研究者指出,它还受到“直觉与深思”“抽象与具体”“远与

近”等因素的影响^[17],从而表现出“不客观”的一面。然而,这恰恰展示了人类“道德责任归因”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这些经验事实的发现,有待整合到新的基于实证基础的道德责任理论中去,有助于我们收获一种更具解释力和预测力的伦理学理论。

[注释]

- ① 这一定义首次约定在《“善良”还是“软弱”——道德责任归因的经验证据与人际差异》(郭晓,《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9年第6期)中。现有研究较多聚焦于对负面结果之“责备或惩罚”的认定与划分,而较少关注对正面结果之“称赞与奖励”的认定与划分,这是对“责任归因”作狭义理解与广义理解的差异。
- ② 对朋友有“及格水平”以上的期待应该不算过分;但其上限100分只有在可以性命相托、一起扛过枪的生死战友以及俞伯牙与钟子期这种传奇中实现,对朋友的期望值在70—90分的阶段会更加集中。
- ③ 2020年5月18日,贵州茅台上涨了40.21元,涨幅为2.53%;而工商银行上涨了0.01元,涨幅为0.20%。前者的涨幅已远远超过后者的当日最高股价(5.10元)甚至历史最高股价(9元,2007年11月1日)。这就是全距受限。
- ④ 比如在三国时代,看起来一团和气的蜀国其实同样是“你我分明”、山头林立。被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夸赞“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的费祎、董允等人,都是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集团”成员(不过诸葛亮荐才、用才总的来说还是公平的),而屡屡在诸葛亮北伐过程中设置种种障碍的则是以李严为代表、后被打压下去的“东州集团”。东州集团的失势并非蜀国“你我之分”的终结,而是“益州集团”与“荆州集团”角力的开始。最后公元263年,以劝主投降闻名的益州集团谯周成功劝说后主刘禅降魏,最终实现了益州集团偏安守成的政治诉求,而谯周本人也籍温庭钧的妙手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从此谯周是老臣”的独特名声。
- ⑤ 群体结构,合作、背叛、博弈、进化是社会科学常研常新的母题。一项新近的研究显示了人口结构和时间对合作的影响,指出较之静态网络,时序网络(temporal networks)更能促进合作(Li A, Zhou L, Su Q, et al.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on temporal networks. Nat Commun 11, 2259 (2020))。
- ⑥ [英]马特·里德利.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与协作的进化[M].吴礼敬,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142-144。在动物中也已经被观察到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弗朗斯·

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中详细描述了大妈妈、耶罗恩、鲁伊特和尼基之间的恩怨情仇,也宣告了“政治的根比人类更古老”。黑猩猩中“首领”强大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善于与雌性黑猩猩和年轻的其他猩猩进行联盟合作。

- ⑦ 转引自:[英]马特·里德利.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与协作的进化[M].吴礼敬,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166。
- ⑧ 见[德]朋霍费尔.伦理学[M].胡其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67。朋霍费尔指出:“‘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太 12:30)”,并认为“耶稣的这两句话必然是相辅相成的”(《伦理学》第 68 页)。
- ⑨ [美]D·M·巴斯.进化心理学[M].熊哲宏,张勇,晏倩,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51。具体观点为 Daly,Salmon 和 Wilson 于 1997 年提出。
- ⑩ 一些来自西方文化背景的实证报告“是肯定的”。在“责任归因”的系列论文中,笔者也给出了肯定回答。
- ⑪ 转引自:叶航,陈叶烽,贾拥民,等.超越经济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63。

[参考文献]

- [1] [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道德哲学[M].王秀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79。
- [2] 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3] 毛新志,刘星.脑成像技术对道德责任判定的挑战[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1(2):135-140。
- [4] 郭晓.“选择的可能”与“控制的祛魅”——一个实验哲学报告[J].浙江学刊,2019(2):70-76。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8。
- [6] 王茹,石志远,程乐森.人际关系与角色类型对归因过程及情感变化的影响[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12):1824-1827。
- [7] [美]埃利奥特·阿伦森.社会性动物(第 9 版)[M].郑日昌,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8] [美]丹·艾瑞里.怪诞行为学 2:非理性的积极力量[M].赵德亮,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86。
- [9] [英]马特·里德利.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与协作的进化[M].吴礼敬,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142。
- [1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
- [11] 赵汀阳.伦理的困惑与伦理学的困惑[J].道德与文明,2020(3):5-16。
- [12] [德]朋霍费尔.伦理学[M].胡其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68。
- [13] [美]D·M·巴斯.进化心理学[M].熊哲宏,张勇,晏倩,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59-260。
- [14] 况志华,叶浩生.自我责任归因与推断的心理结构与特征[J].应用心理学,2009(4):347-355。
- [15] [美]科兹比,[美]贝茨.心理与行为科学研究方法(原书第 11 版)[M].张彤,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34。
- [16] 张家龙.可能世界是什么?[J].哲学动态,2002(8):17。
- [17] 喻丰,许丽颖.道德责任归因中的变与不变[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53-60。